

CHINA'S FAR WEST

FOUR DECADES

OF CHANGE

中国西部
40 四十年



A. DOAK BARNETT

[美] 鲍大可 著

CHINA'S FAR WEST FOUR DECADES OF CHANGE

A. DOAK BARNETT

中国西部 40 四十年

[美] 鲍大可 著

東方出版社



军报

A007532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西部四十年/ (美) 鲍大可著; 孙英春等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8. 12

ISBN 7-5060-1153-0

I. 中...

II. ①鲍... ②孙...

III. 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西部地区-1947—1988

IV. D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9861 号

中国西部四十年

ZHONGGUO XIBU SISHINIAN

鲍大可 著

孙英春 门洪华 张 立

丁 力 王政挺 孙春霞 译

马大任 孙英春 校订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625

字数: 475 千字 印数: 1—3 000 册

ISBN 7-5060-1153-0/C·41 定价: 32.00 元

F127
11

中国西部 四十年

致 谢

在此向为《中国西部四十年》中文版的出版提供重要帮助的三位先生致以我个人最衷心的感谢：

赵宝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研究》主编，是他向出版社推荐了本书；

孙英春，人民出版社编辑，他参与了本书翻译和出版的全部过程；

马大任，美中文化经济促进会长，纽约公共图书馆东方部顾问，他协助作者审阅中文译稿。

鲍大可

序

鲍大可 (A. Doak Barnett) 与费正清 (John Fairbank)、斯卡拉宾诺 (Robert Scalapino) 三人，曾在 80 年代出版的中国学专家名录中被称为美国的“三大中国通”。很幸运，17 年前，我差不多是同时与他们三人结识的。1981 年底我初访美国，就是应斯卡拉宾诺的邀请，去加州柏克来大学担任东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转过年来，我到哈佛大学访问，又去费正清家作客。费正清请我看他家二楼的一个房间，说：“你的老师钱端升教授 1947 到 1948 年在哈佛大学教书时，就住在我这间房子里。”后来，我到了华盛顿，又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院会见了鲍大可。在此之前，他本来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我见到他时，他刚刚转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书。

鲍大可比费正清年龄小许多，比斯卡拉宾诺也小两岁。我见到他时，他刚刚 61 岁，精力充沛，双目炯炯，闪耀着学者的坦诚与政治家的机敏。那一天，我们谈得极为投机。

鲍大可的父亲早年在中国是传教士，曾任杭州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鲍大可 1921 年出生于杭州，在上海长大，15 岁时才回美国读书。先后在耶鲁大学、富兰克林—马歇尔大学等校读完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历任美国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美国国务院外交研究所、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布鲁金斯学会等单位的研究员；以及美利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校

教授；《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特派员，驻中国内地、香港及东南亚记者。数十年来，鲍大可无论是教书、做研究工作，还是当记者，其工作的中心内容都是当代中国问题。可以说是毕生与中国结缘。

1947—1949年间，鲍大可作为美国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中国和东南亚的研究员以及《芝加哥每日新闻》的特派记者，来中国西部宁夏、青海、西康、新疆等地考察。他当时的任务是考察抗战八年后又开始国内战争的中国现状，并分析其发展前景。那时他还很年青，只有二十七八岁。40年后，1988年鲍大可又来到中国西部故地重游。这时他已是68岁的老人，在中国西部走的地方却比40年前还多。除过去去过的地方再走一遍外，还多跑了四川、内蒙和云南几省。据他自己的统计，这次他在中国的行程约有17500英里。在近20个省、市、自治区内47个大小城市进行采访。访问了各行各业的居民，其中包括工人、农民、僧侣、政府干部以及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員，合计约800人。这次旅行采访，他仍保持着当年做记者的习惯，随时随地都把各地所见所闻，每次采访的时间、地点、被访人物以及谈话内容，一一记在小本子上。他这次西部考察，一共写满了44个笔记本。后来他把两次到中国西部考察收集到的资料，写成了这部长达700页的英文大书《中国西部四十年》(China's Far West—Four Decades of Change)，1993年在美国出版。可以想见，书出版后，立即引起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国的中国学专家们的注意和好评。

自1982年我与鲍大可结识后，一直保持联系。后来在香港、北京几次见面。1991年冬天，我去华盛顿时，他已退休，住在乡下写书。我们曾通过电话，用了将近1小时的时间，讨论苏联解体后的中美关系。那次他给我的印象是：头脑依旧明敏睿智，洞

察国际风云，见解不同流俗。

1995—1996年，我应邀到加州波摩纳学院（Pomona College）教一年书，这是我第10次访美。他从华盛顿把这本书给我寄到加州。他在信中表示，自己毕生从事中国研究。这是最后一本关于中国40年社会变迁的著作，希望有机会能用中文奉献给广大中国读者。

我粗粗翻阅这本书后，掩卷沉思。内心很激动，又无限感慨。

中国确实太大，也太复杂。不但外国人难于了解全貌，即使中国人自己，也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例如谈到中国西部地区，说经济条件落后，民族关系复杂，大家都懂。但具体是什么情况？40年来有无变化？则十个人中，恐怕有八九个人都说不清。提到50年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走过的弯路，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人人耳熟能详。似乎50年来，中国办的都是蠢事、错事，简直一无是处。当然，若不是多年“左”倾顽症作祟，今天中国不会仍然这样落后，老百姓的生活，早已有了极大提高。然而，经过这不平常的半个世纪之后，古老的中国到底改天换地没有？与解放前相比，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到底有无提高？凡此种种，无人能说清楚。甚至有人都不认为应该说清楚。与此相反，有些公式化的宣传，应时当令，总不忘记要出来唠叨几句无法使人信服的“空话”、“废话”，想把过去说得“一无错处”。这种陈词滥调的宣传，所以使人反感，就因为只是抽象的歌功颂德，拿不出具体的实际材料，特别是具体的对比材料。没有事实根据的宣传，只能帮倒忙，起反宣传作用。

现在，一位美国学者、70多岁的老人、自称一辈子研究中国对中国还所知不多的中国学专家，拿出了中国西部四十年变迁的

具体对比材料。事实胜于雄辩，我认为不论是外国人或中国人，“想全面了解当代中国基层发展状况的人，必须要读读这本书。”（美国年轻的著名中国学专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对本书评语。）特别是中国人，更应认真一读。

因此，我决心向中国出版界的朋友们推荐这本书。东方出版社的年轻编辑孙英春同志，果然“慧眼识真经”，看中了这一本成本费高，销售量又不会太大，而对中国人来说却是十二分重要的大部头著作。同时，又得到出版社领导的明智拍板，终能使本书呈献在中国读者面前。

关于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我想用不着多说。中国社会科学的大力发展只靠坐而论道不行。必须坚持研究的科学性，认真深入下去，做大量的实证性研究工作。而本书正是一本实事求是，可做实证性研究范例的重要学术著作。

趙寶煦

1998年12月16日

致中国读者的一封信

东方出版社即将出版《中国西部四十年》的中文版，作为本书作者，我十分欣慰。在亲身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我努力在本书中描述现代中国所发生的一些最为重要的变迁。

我是1921年在中国出生的。在我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我一直在研究中国，并就此进行写作。几乎中国所有的地区和省份我都去过，本书就是主要建构在我其中两次旅行和考察的基础上，头一次是在1947—1949年，后一次是在1988年。多年以前，我写了一本书《共产党接管政权的前夜》，概述了我在40年代末的那次旅行。在本书中，我集中描绘在40年后，即80年代末的这次旅行的所见所闻。虽然我曾走遍中国各地，但我还是决定把本书的重点放在中国西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多数人是本书英文版的主要读者，他们并不了解中国的西北和西南地区。我也发现，许多中国人也不熟悉这些偏远的西部地区。所以我希望，本书中文版所提供的信息能够使中国读者感兴趣，其中包括书中涉及的每个地区的人口（包括所有的少数民族）、地理、历史、经济、政府、政治、教育和社会状况，以及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

自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40年时间里，中国西部——内蒙古、宁夏、新疆、甘肃、青海、川西地区和云南——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亲眼目睹这些，对我的震动很大。在40年代末，这些地区大多是在军阀的统治之下，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联系很松散，而现代社会的影响基本上没有渗透到这些地区。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我所涉及的 40 年只是一小部分，但是比起以往任何时期，这 40 年里发生的变化都远为深远。在发展和改革方面，较中国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和省份还有差距，但这里发生的变化已经将西部与中国其他地区和现代世界连接在一起。

80 年代末我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正是邓小平时代的第一个 10 年。在改革的年代里，在新的技术型领导人的领导下，不论是经济发展、现代通讯、改善教育，还是提高生活水平和放宽社会和政治控制方面，中国西部以及中国的其他地区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令我十分震惊。

同样使我关注的是，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国将要面临的巨大难题。这些难题有些是源自于发展的速度太快，但也有一些问题是来自于中国社会：庞大的人口和复杂的历史。在本书中，我描述了我所访问的每个西部地区的成就，也探讨了其中存在的这些难题。

本书中文版几乎包括了英文原版中所有的内容。由于原版过于庞大，加上其他的原因，出版社认为有必要在中文版中删去一小部分的内容，但没有对原版做任何改写和增补。如果读者想读没有任何删节的全书，可以选择英文版。

我衷心希望中国读者能够对本书感兴趣，能够发现它的价值。由于这是一部美国人的著作，它难免有着一些与中国人不同的角度，但是，撰写本书的这个美国人是用了他一生的心血去认识中国，以及几十年来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如果本书能够为美国人和中国人自己了解中国提供帮助的话，我将感到十分荣幸和欣慰。

C. D. B. v

1998 年 12 月 2 日

前 言

20 世纪 40 年代末，我得到了一个游历中国的机会，这个机会对我而言非比寻常，或许也可以说是独特的。从 1947 年到 1949 年，我作为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芝加哥日报》国际部的记者，有机会访问中国的每一个地方。我的任务是分析并报道中国的现状和趋势。这项工作非常有意思，因为 40 年代末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转折时期，此时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经崩溃，中国共产党接管政权并建立了新的革命政府。我在这段时间撰写的文章成为《共产党接管政权前夜的中国》一书的蓝本。该书于 1963 年由蒲兰戈尔出版公司首次出版，1985 年由 Westview 出版公司收入“再版系列丛书”再版。

40 年后，即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又得到了一个从许多方面而言同样独特的机会：沿着我过去的足迹重游故地，重访 40 年前描述过的每一个地方。这次游历，如同上次，也正值中国的转折时期。1988 年是中国毛泽东时代后的“改革十年”的高潮。在这十年间¹，邓小平及其他领导人把中国带上了新的道路，开始了改变中国的历程。

我在 1988 年的工作目标是故地重游。这项任务看起来简单，而实际上却极其复杂和困难：我要用自己的眼光，分析近几年来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的性质和幅度，以及 40 年来中国推行现代化所取得的总体成就，特别是邓小平推行改革的 10

年给中国的许多边远地区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本书即是我所见所思的报告，集中分析和描述了中国西部的边远省区。

力图理解中国是我一生的目标。我1921年生于上海，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我从读大学起，就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更重要的是，自二战以来，我无论是做记者、服务于政府还是在学术界，都把研究中国作为我的主导目标。这些年来，我撰写和编辑出版了20多本关于中国和中美关系的专著。然而，相比我需要去学习和了解中国的知识而言，这些不过是沧海一粟。事实上，我确实逐渐有所了解的是：由于中国幅员如此辽阔，内部如此复杂；也由于中国在现代时期经历着持续而剧烈的变化，中国人民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重大问题殊死相搏。所以，每个人都必须万分慎重，避免对中国泛泛而论，避免对中国的研究、观察和体验脱离基层或存在任何偏见。不幸的是，现在西方盛行的对中国的看法常常缺乏这种基础。

多年来美国 and 大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主要印象是非常易变的，而且变化极大。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尤其多变，经常像秋千一样摇摆不定。美国人有时把中国看作是极其纯朴、理想化的国度，有时却又把极端否定和充满敌意的观点加诸中国之上。当然，这种游移不定的看法有的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和趋向，但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西方观察家眼里；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往往部分是由美国国内政治和态度的变化所塑造，而非源于中国的现实变化。美国常常歪曲和人为地夸大中国的趋向，把这些趋向简单地描述为摩尼教的善恶决斗或者视之为非黑即白。与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的情况很少是全黑或全白，常常带有某种灰暗色调。

我至今还未完全弄明白，为什么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了解中

国各种势力的复杂性、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特定时期的趋势，进而形成对这个国家一个有条不紊而符合实际的想法特别困难。最近一次对中国的看法发生的重大变化的例子就是，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美国对中国抱着盲目乐观的态度，认为这个国家“正在走向民主化和资本主义”；1989 年“天安门事件”后，这种乐观又被极度悲观和过分否定所代替。许多美国人得出结论说，中国已经放弃了改革，正在退回到专制主义的老路上。这两个实例都说明，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是过分简单化的，歪曲了中国复杂的现实。

我无意在此宣称自己拥有对中国“真相”的独特洞察力。我惟一敢说的是，为了解中国，我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在描述我 1988 年访问中国、特别是中国西部（本书的重心部分）的所见所闻之前，让我先就这些年来影响我了解、研究现代和当代中国问题的基本历史背景和个人经历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总结，它们是我 1988 年开始旅行时所带的一部分“知识行李”。

我一直把中国看作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因为她辉煌的历史，更因为她所拥有的潜力。她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就土地面积而言，也是世界上四大国之一，而且历史最为悠久的现存的政体。早在西方的“基督教时代”以前，中国就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和文明之一。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她所创造的成就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在两千年里，中国一直自视为“世界的中心”，控制着现在称为东亚的大片领土，对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汉族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民族，经常受到中亚细亚非汉族的威胁，这个国家曾数度被一个或几个外族征服。然而，中国的文化和文明非常强大，最终，

所有征服者不是被同化、融入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就是被驱逐出境。

然而，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经历了一场广泛而持续的危机。与过去两千多年相比，中国在此期间所发生的变化远为深刻。这场危机始于满清统治的晚期，像过去的朝代末年一样，此时满清政府内忧外患：内部在衰落；外部则面临着外国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大英帝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过去，一个朝代的衰落会引起统治者的变更，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帝国制度。然而，19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是更为深远的，是根本性的。自 1840 年起，形形色色的西方影响通过“外国租界”、“通商口岸”和“势力范围”涌入了中国。促使中国发生变化的因素不仅仅包括外国军队、外交官，还包括商人、传教士、教师和医生。逐渐地，这些外部影响摧毁了中国统治者基本的合法性，破坏了传统制度赖以生存的儒家价值观念。由于西方的影响，中国的新生势力开始改变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

不久，中国的统治者和政治精英就意识到，西方是关乎中华民族及其政治制度存亡的巨大威胁。许多人最终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技术和经济上赶上西方，重新确定中国的政治制度，并试图找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适当位置。这些就是自 19 世纪以来几辈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基本目标。但是，中国人发现，由于种种原因，实现这些目标是极其困难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和国土的幅员辽阔是其中最根本的制约因素。19 世纪中期，清朝统治者首先想把西方的影响拒之门外。这种尝试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几度力图改革传统的制度，这主要体现在 19 世纪 60 年代、19 世纪 90 年代和 20 世纪的前 10 年。然而，他

们又失败了。经过几场巨大的叛乱，包括 1850—1864 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加上世纪转换之际西方（和日本）不断施加压力，清王朝已经奄奄待毙。最终它崩溃了，中国陷入了分裂状态之中。

从 1911 年到 20 年代末——在有些方面直到 40 年代末——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是由地方军阀统治着，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在此期间出现了两个革命运动组织：国民党和共产党。在 20 年代中叶和 30 年代，它们进行了两次短暂的合作。然而，就在国民党的军队即将取得胜利、该党准备在南京建立新政府的时候，它把枪口对准了共产党，迫使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随后，共产党以农村为根据地，创建了自己的革命军队。

从 1928 年到 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近 10 年间，国民党政府在推动中国部分地区走向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也代表着民族主义最重要的期望和大多数中国人对未来的希望。然而，国民党从来没有能够完成统一全中国的使命，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地方军阀的统治之下。更严重的是，国民党政权遭受了严重的内部倾轧和分裂，没有能力解决地主所有制和农村的贫困等基本问题。在 30 和 40 年代，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在农村统治的薄弱，呼吁全民族抗击日本的侵略，从而迅速地扩大了自己的力量。

其实，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政权的弱点就已经开始暴露了。日本军队的全面进攻迫使国民党政府撤退到落后的西南地区，并在随后发生了分裂。战争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最终，物价飞涨和腐败横行摧毁了国民党的信誉，使它失去了群众支持。战争造成了国民党政权在农村地区的权力真空，中国共产党抓住机会，在农村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党组织和军队，这为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之爆发的公开内战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1949

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建立了新政权。

我在中国经历了这些喧嚣的年代。显然，满清王朝的崩溃和所谓“民国时期”的开始发生在我出生以前，但我感到自己与这段时间也有些联系：1910年，我父亲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到达中国，时值这个封建帝国统治的最后一年。我家在杭州一直生活到我出生的那一年，即1921年，而后举家迁往上海。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一年建立的，其诞生地点与我童年的家不过几街之隔。我家在上海一直住到1936年，对满清末年和民国时期开始推进现代化的努力耳熟能详，所见所闻极大地影响着像我这样的外国孩子。从那时起，我研究中国的理智和情感的包袱里就包括在上海的所见所闻，在孩童和少年期间到华北和华中其他城市旅行所留下的印象和记忆。这些印象和记忆包括以下方面：中外人士各种各样好与坏的交互作用；军阀混乱的余音未止；国民党“急进派”的崛起及其占领长江流域的影响（特别是对上海的冲击）。我把中国普遍的极端贫困归结为必然，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活生生的现实，即使深受外国影响的地区也是如此。然而，虽然年纪尚幼，我同样与大家分享着广泛的热情：中国国民党的政权开始促进国家发展，并把中国带向现代世界。

当时，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影响（日本1931年侵占满洲，随即于1932年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和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记忆。尽管当时我很小，还不能完全理解20—30年代的所见所闻，但根植于那些年代记忆中的片段却时常在脑中闪现，伴随着我，成为二战后我继续研究中国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这些早年的记忆给我留下最基本的和挥之不去的印记是：中国面对日本的日益增强的威胁争取生存的斗争和面对几乎是无法

克服的障碍艰难走向现代化的努力。

在 40 年代早期，即大学期间，我开始正式研究中国。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我不可能取得多少进展。我所在的耶鲁大学班级“加速”毕业，此后我立即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上服役。二战结束时，我所在的海军分队由冲绳转驻青岛，从而给了我一个重游上海的机会。我研究中国的潜在欲望就这样被重新点燃了。此后，我“上钩”了。我回到耶鲁呆了一小段时间，学习国际关系，重点研究中国；并开始学习汉语（这次我学习普通话，在幼年时我学过上海方言，但大部分忘掉了）。因此，当我 1947 年得到去中国访问的机会时，我不禁高兴万分。

40 年代末我在中国的经历可一言以蔽之：完全沉浸其中。尽管我也花了一些时间，从南京（那时的首都）、上海、北京（那时称为北平）等大城市的有利角度观察中国，撰写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文章；但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考察中国内地的边远地区。这次游历，我只有两个省没有去，其他则都已去过了。我在四川的一个村庄住了特别长的时间，在那里研究地方政府和政治问题。我几乎走遍了当时军阀统治的所有半自治式的省区，会见当地官员，就他们的统治详情撰写评述文章。最后，我于 1948 年底飞往北京，去观看中国共产党接管北京的情形。我花了 6 个月的时间观察中国共产党怎样巩固权力，组织新政权。从 1947 年秋到 1949 年仲夏所了解的一切为我判断中国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另一个基准——也许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更确切地说，1948 年中国西部各省之行的所见所闻是我 1988 年重游中国、观察判断西部地区是维持现状还是发生变化的起点。

1948 年底，中国陷入了革命与内战，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最